

中国新闻事业史

维新派的报刊宣传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向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思想和文化发起的一次重大冲击，从此，封建政治、思想和文化的传统地位开始动摇，维新派报刊宣传活动作用极大，主要表现在：

第一，向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教育。维新派报刊，特别是其中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不断地向读者宣传“俄北瞰，英西睽，法南隣，日东眈”^①和“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的形势^②，谴责了帝国主义“轻我、贱我、野蛮我、禽兽我、尸屠我”以及“索岛岸”、“揽铁路”、“涎矿产”等侵华罪行，发出了“叱咤英俄，鞭笞欧美，振我夏声，昌我华种”的吼声，从而唤醒了许多知识分子和士大夫，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使他们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运动中去。

第二，向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教育。19世纪70年代王韬就开始介绍西学，到了维新变法宣传时期，经过报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陆续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民主、自由、复民权、开议院的学说以及哲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振动了已冻之脑官”，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他们以此为武器与传统的封建意识进行斗争。

第三，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变法的实现。在维新派报刊大力宣传鼓动下，不但开了“官智”，开了“民智”，而且还开了“帝智”。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发布数十道除旧布新的命令，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由于维新派的报刊把它公诸民众，以至于戊戌政变发生后，顽固派对废科举、兴办京师大学堂和倡办企业、准许民间办报等变法维新措施也不敢变更。

除了上述作用，维新派的报刊活动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作出的主要贡献还有：

第一，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一贯奉行愚民政策，他们严格控制和垄断新闻传媒，根本不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清代统治者对人民实行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其政策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大清报律》规定，“凡造?纬妖书妖言及传惑众者，皆斩”，“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百，流三千里”。一些地方政府也发布过禁止“伪造谣言刊卖新闻纸”之类的命令。早在维新运动兴起之前，王韬等人就发出解除言禁，允许私人办报的呼吁。1895年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但都没有得到清王朝的同意，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只好冒着杀头、流放、监禁的危险，挺身而出在京城办起了报刊，从而在皇城禁苑打开了缺口。1896年《时务报》创刊后，各地维新派报刊如雨后春笋，清王朝言禁的缺口就被冲得更多更大了。“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和一些维新派大臣又促使光绪皇帝下了允许官绅士民办报的诏书，几千年来的封建言禁被冲垮。后来尽管发生了戊戌政变，但是封建统治者垄断新闻事业的时代毕竟结束了。

第二，开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康梁办报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醉心于科举，迷恋于仕途，从事报刊活动的多半是一些科场失意的落魄文人，他们办报的目的或是为了养家糊口，或是为了抒发其抑郁之情，所以当时报刊的内容多是偷盗、火警、凶杀、拐骗、情爱、赌场妓院之类，因此，士大夫知识分子把办报看成不务正业。但自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办报后，社会上对报纸、报人的看法为之一变，这些人不仅学贯中西，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是变法维新的领袖，他们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深深地影响了广大读者。湖广总督张之洞是清代有名的大官僚，既有政治经济实力，又有相当的学术影响，一般人他根本看不起，可是对一个编辑《时务报》的举人梁启超他却在信中称之为“卓老”，他的门下对梁启超更是“甘拜下风，愿交北面”，1897年初，梁启超到武昌时，张之洞甚至要令人开中门迎进。康梁以后，报人、报刊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办报的政治家也愈来愈多了。

第三，创造了报刊新文体，推动了政论写作的发展。康梁办报之前，我国多数报刊流行的还是

1 国人早期的办报主张和办报活动

- 国人早期的办报主张
- 国人早期自办的报刊
- 王韬和《循环日报》

2 康有为与强学会报刊

- 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
- 京师强学会机关报《中外纪闻》
- 上海强学会机关报《强学报》

3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

- 梁启超生平简介
- 梁启超和《时务报》

4 维新派的其他报刊和报人

- 《知新报》、《湘学报》和《湘报》
- 严复和《国闻报》

5 国人办报高潮和维新派对报刊事业的贡献

- 国人办报高潮的出现
- 维新派的报刊思想

6 维新派办报活动的作用与贡献

6 学习思考题

桐城派古文，这种文体内容空虚，形式拘泥，束缚思想。甲午战后，改革浪潮汹涌澎湃，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大量涌进，原来的桐城派古文既无法表达维新派要求变法维新的思想和政治激情，也无法介绍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学和近代的科学技术，于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报刊政治家继承王韬报刊政论的传统，在政论写作中不断突破框框进行革新，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报章文体。这种文体的特点是疾呼救亡，直陈时弊，介绍西学，要求变法，谈古论今，条理清晰，感情充沛，语言半文半白，有时还夹有口语、俚语及外国语法，因而平易畅达，易于表现新思想。这种文体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政论最为典型，故被称为“时务文体”。时务文体的出现推动了变法维新的宣传，变法维新的宣传也促进了报刊政论的发展，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谭嗣同、后才常都十分重视报刊政论的写作，他们的政论文章成了他们所办报刊的重要的甚至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康有为的《京师强学会序》就是《强学报》的旗帜，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就是《时务报》的灵魂，可以说报刊政论从此在中国文体中的地位更为重要。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在中国办起了《新民丛报》，他的报刊政论《少年中国说》等在原来的时务文体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不仅思想新，文言成分也更加减少，人称“新民体”，它在《新民丛报》上地位重要，许多报刊也跟着学习，这标志着报刊新文体（又称“报章体”）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

①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5页。

② 梁启超：《南学会序》，《时务报》第31期。